

认识中国：从费孝通的社会调查经历谈起

周大鸣¹

【摘要】 费孝通一生致力于社会调查。费孝通一生都是在不断地开展社会调查与概念分析中度过的，并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中国。通过回顾费孝通先生一生的社会调查经历，以及所创造的关键学术概念，可以探讨社会调查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 费孝通 社会调查 方法论

一、引言

怎么样做社会调查，向来是知易行难。若是希望更进一步，在进行社会调查的同时，将零散的资料进行理论化整合成一系列的概念就更为困难了。本文试图通过费孝通先生的社会调查经历，来讨论这一问题。

费孝通毕生没有停止过社会调查，也没有停止过关于社会调查的相关写作，不论是研究报告、专著、论文，费孝通不拘一体，均有创见。所以有很多的研究都围绕着费孝通一生中怎么样做社会调查，将其作为研究内容⁽¹⁾。笔者把“认识中国”放在一个题头，实际上是认为在费孝通的研究历程中，其社会调查是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途径，而且是一个主要的途径。

费孝通曾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认识世界的方式，主要是在书本和经典的著作学习里进行，所以我们才有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的说法。我们过去强调书本以及经典著作的重要性，这种强调当然很有道理，因为经典记载了过去我们对于世界认识的经验和总结。

但是费孝通认为，若是只通过书本来认识社会、认识中国的话，应该有两个逻辑前提：一个是过去出版的著作里包含了我们人类所有的知识，因此任何的知识都可以从书本中得到了解与答案；另一个前提是过去的书中，应该包含了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的所有问题都应该包括在过去出版的书中。

当然，实际上这两个逻辑前提是不成立的。特别是在一个发展日益迅速、竞争强度日渐增长、社会状况日趋复杂的时代，我们的认知也处在知识爆炸的情境中。这样的中国，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还是解决问题的需求，要面对的要素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复杂。所以按照费孝通的说法，认识和治理中国这样的社会，应该要以社会调查作为根本途径。通过社会调查，才能够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进而系统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案。

费孝通的社会调查方法，可以从几个方面讨论。首先是上文谈到的，费孝通认为社会调查是认识论的起点，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是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回到实践的一个认识过程。我们要认识社会，必须从实际调查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其次是费孝通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功能主义的。

¹**作者简介：**周大鸣，男，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及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等课题十余项，出版有《凤凰村的变迁》《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珠三角的透视》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各类论文百余篇。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中国城市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8JJD840002-1）

费孝通自述他的一生受三位老师影响。第一位是吴文藻，教给了他社会学的基本方法，尤其是社会学怎样中国化，怎样开拓社区研究。第二位是潘光旦，教会费孝通怎么把人的生物性跟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潘光旦提出了位育的概念，就是把人的生物性与人的文化性结合起来进行研究⁽¹⁾。第三位其实是三位外国人，一位是帕克，早年他来北京讲学，费孝通在北京听过他的讲座，他的研究主要是芝加哥学派的，有些类似后来的社区研究。第二位是史禄国，主要是教费孝通人类学，尤其是体质人类学的方法。第三位就是马林诺夫斯基，费孝通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随他做博士论文，跟他读了两年博士生课程。

费孝通的文章里说，主要是跟马老师一起，一个是读书，一个是 seminar，接受的是功能主义的这一套分析方法⁽²⁾。从费孝通接受的学术训练来看，他拥有比较丰富的知识结构。所以在他后来的研究中能够有广泛的联想和深入的思考，能够基于经验提出很多概念，这与知识的广博有一定的关系。费孝通社会调查的方法论，非常强调知识背景的广博。

费孝通还强调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的区别，社会调查就是描述性的，告诉我们社会是什么，《江村经济》这本书，就是一种描述性的著作，也就是如今所说的民族志。所以需要辨析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社会学的调查与社会调查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社会学调查是要带着问题去调查，除了描述还需要解释，费孝通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的分水岭，是云南三村的调查。1938 年，费孝通从英国拿到博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云南，希望将刚刚学到的这一套社会学方法运用于调查。他带着问题，在江村经济的基础上，去调查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

从今天看，社会调查有两种面向，一种是做描述性的民族志，一种是带着问题或者带着假设去做社会调查，来论证假设与作出一些解释性的分析，这也就为如今调查需要使用哪种模式做了一个区分。我们有时需要做一个民族志的调查，有时候需要做一个社会学的调查，有时候是带着问题去做调查。

二、费孝通的社会调查经历

费孝通在《社会调查自白》的小册子里面，谈到他的社会调查经历。首先是做瑶山调查，然后是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再然后访美日记、民族识别、“小少民族”调查，小城镇调查、知识分子调查，等等。当然，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查，《行行重行行》一书中，实际上就收集了他的一些调查报告。

首先看瑶山调查，当时史禄国希望费孝通的研究先从做异文化开始，因此他选择做瑶山的研究。费孝通当时新婚不久，跟王同惠女士一同去瑶山做调查，调查的结局有些悲剧色彩。这应该是费孝通一生惦记瑶山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费孝通脑海中终身摆脱不了的印记。

所以，在几十年后《花篮瑶社会组织》这一本书出版时，他在后记里谈到当时生不如死的心态和经历⁽¹⁾。费孝通与王同惠合作的《花篮瑶社会组织》，实际上依然是用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主要是用描述性的方法做调查。读毕《花篮瑶社会组织》可以发现，它研究的是家庭与亲属，社会组织和亲属团体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人类学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早期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

费孝通在多年以后依然惦念着这件事，所以指导他的学生多次去大瑶山做调查。现在大瑶山里面有一个纪念碑，纪念费孝通与王同惠的瑶山调查。因为费孝通脚受了伤，在广州住院几个月后，他回到江村休养。当时他的姐姐费达生在江村做了一个桑蚕的实践基地，所以他在休养的过程中做了一些调查，完成了他博士论文最基本的材料收集与实地调查。

江村经济里面所提出来的乡村问题，如今看来依然非常有启发。费孝通在书中提出了农村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是手工业的衰落，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入侵，大量工业化产品进入到中国乡村，导致乡村手工业衰落；第二是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当时费孝通在江村做调查，很多土地所有者并不在江村，甚至并不在江苏，所以土地所有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关于土地

所有权以及土地所有权怎样流转，到现在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我们强调农村土地政策的改革，有各种各样的方案，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怎样充分利用农村土地来发展。如今的江村与费孝通最初去的江村已经大有不同，现在的江村已经完全成为一个链接全球的工业社会，它们的产业已经成为全球大分工的一部分，可以通过电商将它们的纺织产品以及各种商品销往全国乃至全球。当年费孝通在江村做调查的时候，想说明的就是世界经济对江村这样一个村落的影响，如今仍然可以看到村落与世界的互动影响。

费孝通的另一个调查是云南三村，费孝通 1936 年去伦敦经济学院读博士生，1938 年 9 月完成学位答辩后便立即赶回中国。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所以他直接到了云南。费孝通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来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对云南三村的调查。过去很多学者质疑费孝通只做了一个江村的研究，如何能够代表整个中国，所以费孝通认为要真正认识一个完整的中国乡土社会，还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

在选择云南三村的时候，实际上费孝通是按照三村的不同分类进行研究。一个是以农业为主的禄村，一个是以手工业为主的易村，还有一个是以商业为主的玉村。比较费孝通在云南三村的调查与过去在江村进行的调查，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调查更为精细化了。

费孝通将这种研究称为微型研究，微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范围内，同当地人结合起来，对这些地方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研究。这是过去社会人类学所常用的方法⁽²⁾。这种研究方法，在调查农村的时候，需要仔细地观察一亩地要费多少劳动力，能够收割多少粮食。今天回顾云南三村的研究，回到费孝通做过研究的禄村，可以发现它早已完全和县城融为一体，进入到城市化的范畴中了。

费孝通的另一个重要调查成果是外访日记，主要是他前往英美等国家进行访问后的成果。费孝通去英美各国做了几个月的访问，以一个人类学家的眼光对美国社会进行观察，因此很多人认为他的访美日记是一个访美的田野调查日记，是他对美国人当时的生活、美国社会的一些状况的描述。即使今天重新审视，也依然使人有所启发，费孝通看得很细微，见微知著⁽¹⁾。

费孝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主要组织和参与了一个最重要的活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后来我们把它称为民族识别。民族识别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当时费孝通主要负责南方片区。后来，费孝通在专门的文章中提到关于民族识别的重要性。费孝通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如果要治理好这样一个大家庭，得弄清楚这个大家庭有哪些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群体，摸清新中国的家底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²⁾。

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已经 70 岁高龄了，但费孝通自述在自己 70 岁时，学术生涯开始了第二春——他开始重新进行研究工作。费孝通在他的《社会调查自白》中言明，在改革开放后，他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调查，首先是小城镇调查，其次是乡村调查，再次是知识分子调查。做这些调查的首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地区的农民开始自发地走非农业的道路，小城镇的发展在江南、珠三角等发达地区，成为一个很有显示度的，全社会都十分关注的一个社会事项，为此费孝通展开了研究⁽³⁾。

对于这样一种事项，当时的很多学者是以一种负面的角度去理解的，费孝通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是考察它积极的方面，并就此专门写了一系列文章，每一篇篇幅都很长。费孝通白天做调查，晚上整理笔记，然后再写成文章，每次一调查完就将文章投出发表。费孝通提出小城镇的调查，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希望理解小城镇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其次，小城镇的发展是一个乡村自发的，一个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这样的发展在当时是减少制度性成本的发展方式，所以他希望通过小城镇的调查，对小城镇进行一个分类。

基于此，费孝通提出了之后颇具影响的几种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划分，实际上体现了费孝通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不能用一种模式来全部概括，不同的发展模

式对应的是不同的发展要素。所以费孝通把温州模式归纳为小商品的发展模式，将苏南模式理解为企业下乡，因为它依托上海发展起乡镇工业。珠江模式就是前店后厂，主要是依托港澳把工厂建设在珠三角，窗口在港澳。他提出的几种模式至今还能看出多样性在发展中的作用⁽⁴⁾。

改革开放伊始，费孝通组织开展了知识分子调查。费孝通希望通过知识分子调查，促使国家重视知识分子、重视人才。因此，知识分子的调查跟国家的人才战略是联系在一起的。

此外，费孝通还主导了一个项目——“小少民族”调查，即总人口 30 万以内的民族调查。到了现在，“小少民族”调查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在《甘肃土人的婚姻》的序言里，费孝通认为将“小少民族”放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来看，具有重要的地位。“小少民族”能够在大的民族中间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河湟流域的几个“小民族”，比如东乡族、土族，还有裕固族、撒拉族这些都是人数很少的民族，在费孝通调研时总人口应该都在 10 万人以下。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在大的民族中间生存下来一定有它内在的逻辑。实际上通过研究“小少民族”，展现的是一个区域中的民族关系。当时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正是在认识“小少民族”的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民族走廊的概念⁽⁵⁾。

三、社会调查与认识中国社会

社会调查的目的不是调查本身，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是要认识社会，或者说认识中国社会，然后在认识中国社会的基础上，来提出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费孝通一生中提出了很多概念。他最早提出一个内涵丰富的五谷文化的概念，五谷一词其实直接包含了中国的南北东西中，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民族没有比五谷更贴切的词语能够概括了。五谷文化是极具包容性的概念，他没有使用稻作文化也没有使用麦作文化，而是用了五谷这个概念，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他强调五谷文化，认为农耕文明的核心是对作物的逐步栽培管理，而它的文化是围绕作物栽培的一套生产生活方式。

另外一个概念是差序格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列举的例子浅显而形象，一块石头扔到池塘中，波纹从中心往周围散开，费孝通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运行方式，以自我为中心向周围散开。

费孝通把云南三村的调查、江村的调查等等一系列研究都综合起来，提出乡土中国的概念。费孝通希望概括出作为农业社会的中国乡土中具有特色的东西，认为差序格局是乡土中国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同时费孝通还强调了乡土中国里面男女有别的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的结合，都是乡土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除了血缘和地缘，业缘也很重要。费孝通提出一些概念化的表述，希望将中国概念化。今天来看，这些问题依然具有生命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文字下乡。从晏阳初、梁漱溟一直到费孝通研究乡土社会，他们研究的共同点是认为乡土社会需要重建，需要改变，需要发展。怎么样去改变乡村社会？怎么样去重建乡村社会？费孝通认为文字下乡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讲到，过去地主阶级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所以实际上地主阶级通过掌握文字而掌握文化，也就掌握了话语权。要重建乡土，就必须普及教育，推进文字下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了我们现在。通过教育来改变贫困，来改变乡村的落后状况。

费孝通的另一本重要的著作《生育制度》，被很多人忽视，但其实这是一本最基础的理解中国社会的书籍。它讲的是家庭、婚姻等最基本的东西，以及家庭与家族的关系，这些都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制度。我们围绕着一套生育制度，建立起一套文化的法则。有些东西变化很快，有些东西变化很慢，笔者经常讲汉人社会以父系继嗣作为一种传统，这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变，这就是生育制度。这个基础的制度没有变，在这个基础上研究中国社会时，就要清楚哪些东西影响着我们的整套文化法则。

有一组重要的概念，民族走廊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两者是一个紧密相联系的话题。1978 年开始，费孝通多次提出并逐渐明确了民族走廊的含义与内核。他当时提出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后来又加上了东北亚走廊。费孝通认为中国

的民族是周边的民族和中央的民族，通过这几大走廊联系在一起，互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格局⁽¹⁾。

所以费孝通当时强调藏彝走廊、河湟地区、河西走廊的研究，民族走廊在今天依然具有创新意义。现在研究苗疆走廊、藏彝走廊、河西走廊的学者渐渐多了起来。当然还有费孝通说的东北亚民族走廊，现在其实各种走廊的研究都开展起来了。费孝通建立民族走廊概念的重要点，是要打破单一民族研究，打破单一行政区划研究的局限。因此费孝通一直不太主张单一民族的研究，而强调中华民族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状态。

如今的中国实际上正在从地域社会向移民社会转变，从一种以地域性为中心的文化，向一种多元文化转变⁽¹⁾。民族走廊可以让我们看到过去中国的人群互动，走廊概念可以反映其中的互动关系。过去强调中原文化对周边文化的辐射传播，没有讲周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因为作用和反作用必然是同时存在的。费孝通用走廊这个概念，就避免了传播决定论的那样一种说法。囿于过去的中原决定论的影响，束缚了一些思想理念，费孝通其实在努力打破这个局面。

费孝通的另一个基础性贡献，就是“文化自觉”的提出。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费孝通 1997 年在办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开班仪式的讲话上提出来的，后来专门出了一本书《文化与文化自觉》，把费孝通的很多相关文章结集出版了⁽²⁾。

在文化自觉论提出后，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转型的概念。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专门组织了一个人类学系列讲座，在讲座上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转型概念，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转型，还存在一个文化转型的问题。我们的社会经历了从地域社会向移民社会的转变，费孝通提出了处理族群关系的 16 字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从这些概念中可以看到，费孝通对于概念的概括来自对最基层的乡土社会的认识，然后到小城镇的研究，然后到文化自觉与文化转型，到最后应该怎样处理文化问题，即各种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

四、以调查方法认识中国

费孝通在社会调查中运用了一系列方法。第一是个案研究，第二是社区研究，第三是类型学方法，第四是比较研究法，第五是区域研究法，第六是整体研究法，这六种方法实际上是自成系统相互联系的。比如个案研究，费孝通认为他早期对花篮瑶的研究以及江村的研究，都是个案研究。还有社区研究的方法，社区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通过聚落村落这种聚集人口的方式，把空间和人口结合做一个综合性调查。

在做研究与调查的时候，需要掌握的是一种立体的思维，一个立体的概念。要研究一群人，就要研究这一群人的环境，以及这些人与周边的关系，费孝通做研究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他研究花篮瑶时，先从家庭婚姻与亲属到村落组织，再探讨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一整套整体的视野。同时，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社会内部极为复杂，需要分类进行研究，每一类找到它的典型。

其实模式的研究，也是一种分类的方法，模式的分类是复杂的。费孝通云南三村是以主要的生计方式作为分类原则，根据原则把村落分类，然后按照类别选择做不同类型的典型研究，这就是费孝通的类型研究方法。通过分类来做研究的方法，到今天还是一个必须的研究路径。研究总体时，不可能一个整体都能够让研究者进行研究。怎样去研究整体？还是要通过分类。做研究收集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零零碎碎的材料，把材料归类，通过归类来分析每个类别的特性，再把它归结起来，总结出问题和解决方法，这就是一个做研究的方法。费孝通使用这样的方法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不同类型的东西归结出它的特征。

分类完成后，很自然地就是去做比较。以商业为主的村落会是什么样的，以农业为主的村落和以手工业为主的村落会是什么样的，便自然会开始进行比较。所以如果不进行分类，也就无法对不同的类型进行比较。因此费孝通认为不仅要做社区研究以及个案研究，还要强调区域的研究，比如民族走廊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区域研究类型。

后来，费孝通要将所有的研究都上升到关于整体的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费孝通提出的很多理念是非常有意思且有先见之明的。费孝通当时说中国就像一盘棋，东南沿海的开放是一个眼，西部民族的发展是另外一个眼，因为一盘棋至少要有两个眼，才能够做活。根据围棋规则，每一片棋要活总要有两个眼，所以费孝通就将沿海的开放与西部的发展视为中国这盘围棋要做活的两个眼，当然费孝通在提这个论断的时候，还没有西部大开发。费孝通很早就提出中国这样一个整体发展格局，不能只有沿海的开发，不能只有东南沿海的发展。后来笔者也提出一个中部发展——“非东西”的发展。因为中部既不是东部也不是西部，比如说湖南、安徽、江西、湖北、河南这些都是中部地区，既不属于东部，也不属于西部，所以叫“非东西”。如今的高速交通把东西中都连接起来，中部的凸起、西部的发展、东部的腾飞，实现了费孝通的整体发展理念。

从这里可以看出费孝通的研究既有微观的接地气的研究，又能从宏观层面去思考整个国家的未来，这是他的研究能够有影响和生命力之所在。

费孝通进行研究分类时，也将不同的分类方式带入了研究中。他在研究花篮瑶的时候，提出了一种叫作格式的分类法。在研究禄村的时候，提出了形式作为分类方法。在强调不同形式时，在云南三村的研究中，提出了类型的概念。之后的小城镇调查，他使用类别这个关键概念。之后更进一步，提出了模式的概念⁽¹⁾。

五、社会调查关键词

纵观费孝通的研究经历，他善于建立一些概念。赵旭东曾经概括了费孝通一生研究的关键词——行、访、实、知、觉。这五个字，实际上讲明了费孝通认识中国社会的全过程⁽²⁾。

费孝通一生的社会调查，首先强调“行”，他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作《行行重行行》。这本著作收录了费孝通在各个地方考察所写的报告。包括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到甘肃等西部地方的调研报告，在少数民族地方的考察报告，等等。也包括了全国各地的调查记录，费孝通每访一地，就把考察所写的调查报告，全部都记录下来，所以叫“行行”⁽³⁾。

费孝通认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应该多出去看看，反复看，从他的《十访江村》《五访瑶山》可知他不是只去一次，而是反复跟踪观察。这个行，其实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他所要强调的。其实每个人的直觉是与生俱来的，人的眼睛的分辨力是极强的，所以只要走得多看得多，知识积累也自然会增多。“行”是费孝通的第一个关键词，他到任何地方考察，并不太注重当地人做汇报，他要求别人带他去看一看，而且他的眼睛很厉害，能看透事物的实质。

费孝通曾经提过一次调研经历，有一次他带着江苏警官学院的学生一起入户做问卷调查，只做了两户就收队回程。回到休息地，费孝通跟随他一起调查的学生，问他们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他们都答不出来。费孝通就说他们调研的第一户是没有做准备的，第二户是做好准备的，知道有人可能要来调查。费孝通解释为什么看出来第一户是没做准备，因为他们在访问第一户的时候桌上有小孩子踩着的脚印，他们去访问的时候脚印还在，说明这个主人没有准备。费孝通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提醒跟随他的学生，有准备的接受调查和没有准备的接受调查，是有区别的。这是很小的细节。然后费孝通又解释，为什么他知道第二户做好了准备，费孝通从第二户家里的整洁程度，还有户主回答问题不慌不忙的态度，就可以判断对方是有准备还是没准备。这就是行的积累所获得的经验，所以同样在一个地方的考察，有丰富经验的人看到的东西多，得到的信息量大。

第二就是“访”，他除了行以外还要访，他不断地访问家庭，访问个人，访问工厂，不断地到不同的地方做实地调查与访问。费孝通到了晚年，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费孝通晚年的地位越来越高，下去做调查的时候实际上大家都明白高层的领导来了，下面会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他要得到真实的材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费孝通依然能够通过一系列实地调查写出调查报告。

第三个就是“实”。费孝通一生追求实践，志在富民。所以他的研究与调查的应用性是非常明确的。费孝通做的不是纯理

论研究，他一直做的是应用性研究，所以他前往美国丹佛领受应用人类学协会颁发的马林诺夫斯基奖的时候，演讲的题目就是“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费孝通丝毫不隐瞒他愿意为国家、为人民做实事的研究目的。这种坦率也是实的一种，毫不遮遮掩掩，并不避谈自己做的是应用性研究，也并不认为理论性研究就比应用性研究更为重要，两者其实同样是被社会所需要的。

第四个关键词是“知”，从认识的角度来讲，我们通过行动、访问、实地考察，最终的目的是去感知、认识这个世界。在整合完调查材料后，需要形成一种概念，并用理论性的话语将其解释出来，所以知就是要通过实际调查去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与建议。从其他人说的话中，看到话语背后的东西，并通过自己的综合能力去分析它。费孝通之所以能够提出那么多概念，是因为他不断地行与访，进行感知而分析获得的。费孝通的很多概念到现在依然被广泛讨论与使用，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用好其实更加不易。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觉”，这是另外一个境界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如何立言？实际是知识分子要做到，自己的精神产品是自身对所处文化的自觉的结果。要达到这种境界是十分不易的，所以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¹⁾。很多学者在研究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自觉这个概念的产生与中华民族的产生具有极深渊源。诚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²⁾。

一个人要成为一个自觉的人，通常给人的感觉便是这个人很不一般。我们往往是认为一个人有大智慧才会形容他有觉悟。费孝通晚年，很多事情是他自觉出来的。所以费孝通说他一生比较简单，只是在做一件事——志在富民。这件事情费孝通一生都没有改变过，这是他一生与人交往的方式，也是他一生处理问题的方式，费孝通认识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六、结语

做社会调查，是人类学学科的必需过程，是从事人类学学科的每一个人所必须要做的事情。怎么去做调查、怎么进入调查点，这一关一定要过，这既是个人无法推卸的核心责任，也是学科无法替代的核心方法。笔者一直强调人类学调查，它可以被认为是定性研究的一种，但不完全等于定性研究，因为它强调个人的亲身体验，强调个人感悟，这和一般的定性研究不太一样。田野调查结束后描述出来的东西，必须要有现场感。有的观点认为人类学就是做定性研究，这种判断不太准确，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做法律文本可以做定性研究，做历史文本可以做定性研究，但它们都不要求到现场去。如果到现场去，有了现场感会很不一样。所以很多研究历史的学者，也要到现场去考察一下古战场是怎么样的，古代交通是怎么样的，有些研究必须要有一种现场感。我们经常讲百闻不如一见，这就是必须做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原因。

做社会调查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见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这也是社会调查需要注意的一点。就如之前费孝通经历的调查，有的受访对象已经做好了准备，去做调查时，受访客体会想象调查主体需要什么样的答案，需要提供什么样的答案。所以即使是实地问答，调查者获得的回答也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也是为什么需要专业学者进行研究的原因，不能完全盲目地相信所见。做社会调查，除了亲眼见到的，应该还要用其他的方法去补充，去旁证，还得有逻辑推理。

做社会调查，调查者得到了调查资料，田野调查做完了，怎么使用这些资料进行分析、怎么写出报告、怎么去组织资料？这一点需要好好地向费孝通学习，费孝通每做完一个考察，马上就可以完成一个报告。即使我们做不到费孝通的这种效率，至少费孝通的例子可以给人提一个醒，今日事今日毕，有事情马上做完，因为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可能有很好的短暂记忆力，但事情经历的时间长了，尤其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场面以后，可能就会忘掉很多事情。特别是现在流动性越来越强，流动频率越来越快，流动的地方越来越多，这样的问题就越发突出，越需要引起重视。

所有研究到最后当然要形成一个概念，概念的实质是理论提升。比如费孝通把小城镇调查做完后，就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概念。费孝通每次研究都会提出问题与新的概念。比如江村调查，他在江村研究中提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手工业的衰落问题，因此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里面给了费孝通一个很高的评价，认为是里程碑式的研究。费孝通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开展社会调查与概念分析，都在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中国。

（本文是由作者于 2020 年 10 月 8 日，在厦门大学人类学云中讲堂的题名为《认识中国：从费孝通先生社会调查经历谈起》的演讲录音整理修改而成。）

注释：

1 赵旭东：《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对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思考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6 期。

2 费孝通：《想起潘光旦老师的位育论》，《西北民族研究》2000 年第 1 期。

3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4 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8 页。

5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要把宏观研究与微型研究结合起来》，《中国社会科学》1982 年第 4 期。

6 费孝通：《外访杂写》，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8—117 页。

7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 1 期。

8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北京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 页。

9 费孝通：《各具特色的吴江小城镇》，《瞭望周刊》1984 年第 2 期；《小城镇大问题（之二）——从小城镇的兴衰看商品经济的作用》，《瞭望周刊》1984 年第 3 期；《小城镇大问题（之三）——社队工业的发展与小城镇的兴盛》，《瞭望周刊》1984 年第 4 期；《小城镇大问题（续完）》，《瞭望周刊》1984 年第 5 期。

10 许让神父：《甘肃土人的婚姻》，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 页。

11 李绍明：《费孝通论藏彝走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

12 周大鸣：《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社会学评论》2017 年第 6 期。

13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99 页。

14 杨青云：《费孝通关于“模式”概念的认识过程及对当下的启示》，《劳动保障世界》2020 年第 20 期。

15 赵旭东：《费孝通思想的关键词》，《读书》2018 年第 7 期。

16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群言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39—456 页。

17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3 期。

18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4 期。